

# 日本青少年蛰居的心理文化根源

## ——基于人际关系的视角

■ 师艳荣

(天津社会科学院 日本研究所 天津 300191)

**【摘要】**蛰居是当今日本较为严重的青少年问题之一,蛰居青少年数量高达数十万。蛰居不是单纯的空间闭居,蛰居者回避的是人际关系,其实质是对社会交往的恐惧。日本青少年之所以蛰居现象严重,与日本的心理文化密切相关。依赖心理支配下,依赖关系的解体带来了青少年的“无缘化”;耻感文化下,“不给别人添麻烦”的行事准则束缚了青少年的人际交往,加剧了蛰居青少年的耻感意识;集团主义教育和文化下,自我的缺失加重了青少年的孤立性。由此形成的人际关系危机成为青少年蛰居的心理文化根源。

**【关键词】**日本青少年 蛰居 依赖心理 耻感文化 集团主义

DOI:10.16034/j.cnki.10-1318/c.2020.03.019

蛰居是一种丧失社会行为、自我封闭的消极生活状态。蛰居萌芽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后,已步入富裕社会的20世纪70年代末,并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不断恶化。20世纪90年代逐渐被社会认知,2000年前后发展成为社会问题。日本内阁府2015年的调查结果显示,在15-39岁人口中,青少年蛰居者达到54.1万人<sup>①</sup>。值得关注的是,有些人数年或数十年过着蛰居生活不能自拔,蛰居问题的严重性可见一斑。

蛰居与娇惯、懒惰等没有必然联系,也并非单纯的性格问题,而是战后日本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由社会、家庭和学校共同造成的社会病理现象。蛰居不是单纯的空间闭居,人际关系危机是蛰居者面临的最大问题。蛰居者“不是不愿意工作,而是对工作中需要涉及到的复杂人际关系感到恐惧”<sup>[1]</sup>。他们拒绝与人交往,很少外出,整天闷在家里,而且大部分时间蜗居在房间内,过着昼夜颠倒的生活。蛰居是任何国家都可能出现的问题,欧美发达国家也存在与蛰居相似的现象,但日本的情况最为严重,这与日本的心理文化密切相关。笔者在以往的研究中已从社会、家庭等领域探讨了日本青少年蛰居问题产生的原因<sup>②</sup>。本文基于人际关系的视角,着重从依赖心理支配下依赖关系的解体、耻感文化下“不给别人添麻烦”的行事准则、集团主义下自我的缺失等方面,分析日本青少年蛰居的心理文化根源。

收稿日期:2020-02-15

作者简介:师艳荣,天津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副研究员,博士,主要研究日本青少年问题。

基金项目:本文系天津社会科学院东北亚区域合作研究中心2019年年度项目“人际关系视角下日本青少年蛰居的历史文化根源研究”(课题编号:DBYLW190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① 内阁府政策统括官(负责共生社会政策):《关于年轻人生活的调查报告书》(2016年9月),<https://www8.cao.go.jp/youth/kenkyu/hikikomori/h27/pdf-index.html>

② 参见师艳荣《日本社会转型与青少年蛰居问题的演变》(载《日本问题研究》2016年第1期)、《家庭变迁视野下的日本青少年蛰居》(载《中国青年社会科学》2016年第6期)等论文。

## 一、依赖心理与蛰居青少年的“无缘化”<sup>①</sup>

### (一) 战后依赖关系的建立及其表现

依赖心理源于日语词汇“甘え”(Amae),中文译法有“依赖心理”和“娇宠心理”等。日本著名精神病学者土居健郎在《日本人的心理结构》一书中,探索了构成日本社会结构、人际关系核心的依赖心理。他认为“依赖不仅是理解日本人的精神结构也是理解日本社会结构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概念”<sup>[2]</sup>,并指出“依赖的心理是调节人际关系不可缺少的润滑剂”<sup>[3]</sup>。对于岛国日本来说,这种彼此间关系密切的依赖心理是日本社会结构和人际关系的核心,也正是有了这种依赖心理,才使得日本人具有其他民族所不具备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依赖心理是日本社会结构中依赖关系建立的基础。日本社会向来重视集团主义,强调人与人之间的依赖关系。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带来了产业结构的变革,完成了由农业社会向企业社会的转变,城市化和核心家庭化进程加快。虽然传统的村落共同体价值观衰落,但依赖心理依然影响着日本人的生活方式。与国际社会相比,日本人对家庭和企业的归属意识非常强,战后经济高速增长期所形成的雇佣体系就是在这样的感情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日本人忠于企业,为企业献身,企业为了满足丈夫对家庭应尽到的责任,制定了将妻子作为被扶养人的相关纳税政策,这样就形成了丈夫为企业效力,妻子为家庭奉献、教育孩子的角色分工。

战后日本社会结构中的依赖关系突出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角色分工模式,二是“终身雇佣”和“年功序列工资制”的企业用人制度。夫妻之间是一种相互依赖的角色分工模式,丈夫挣钱养家,妻子则相夫教子,专事家务。职员和企业之间则结成了唇齿相依的利益共同体关系,职员视企业为家,效忠于企业,企业也保障职员有稳定的收入和定期升迁的机会。由此形成的家庭关系、企业关系是社会结构有效运转的保障,一度成为日本社会结构和人际关系的核心。在日本,“家和家人”“公司和员工”之间的关系,从本质上来看是类似的。正如无法分割的亲子关系一样,终身雇佣制构建的是一种家庭关系<sup>[4]</sup>。这种日本式依赖关系下结成的血缘和社缘,不仅维护了家庭稳定,成就了日本经济的辉煌,而且在保障青少年成长方面也发挥着积极作用。

### (二) 依赖关系解体加剧了蛰居青少年的“无缘化”

20世纪90年代初,泡沫经济崩溃,使得上述的依赖关系失去了存在的经济基础,逐渐走向解体。经济不景气使得不少企业倒闭或裁员,失业率提高,终身雇佣制和年功序列工资制逐渐瓦解。这种忠于企业的依赖关系随着经济低迷出现了崩溃的迹象。“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模式受到冲击,为补贴家用和实现自我价值,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摆脱传统性别分工的束缚,积极就业,从而走向社会。

伴随着依赖心理支配下依赖关系的解体,家庭模式、就业形态等都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单身家庭、丁克家庭等不婚不育家庭的增多弱化了血缘关系,钟点工、派遣员工、合同工等非正式雇佣率的不断提升不利于稳定社缘关系的形成。日本由人与人之间充满依赖关系的有缘社会,逐渐走向了人际关系疏离的“无缘社会”,即人际关系的疏离,源于因血缘、地缘、社缘等各种“缘”的解体而引发的“无缘死”的现象。这也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蛰居问题凸显的重要背景之一。

<sup>①</sup>“无缘化”是指青少年成长中血缘、地缘、学缘和社缘等各种人际关系的弱化,参见师艳荣《日本青少年“无缘化”现象解析》,载《中国青年社会科学》,2015年第2期。

人际关系是个体从自然人向社会人发展的纽带。任何一个个体要成长为合格的社会人,不可避免地要与他人接触,通过人际交往为立足于社会积累个人资本。在青少年的成长过程中,从血缘、地缘的结成,到学缘、社缘的建立,都是个体社会化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人际关系。然而,在人际关系危机日益加剧的无缘社会背景下,伴随着家庭纽带的松散、邻里关系的淡薄、校园问题的频发、职场关系的疏离,血缘、地缘、学缘和社缘等人际关系不断弱化,青少年“无缘化”现象凸显<sup>[5]</sup>。从孩童时期缺少玩伴、学生时代同窗友情缺失,到成年后找不到稳定工作,进而影响到结婚成家。“无缘化”现象已成为当今日本青少年面临的严重人际关系危机。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长期不景气的经济环境下,年轻人的生存竞争异常激烈,生理的、心理的压力也与日俱增。但是,在无缘社会的背景下,家庭、学校和社会都失去了可以倾诉的场所和环境,所有的烦恼都深藏于内心深处而无法释放,于是,蛰居就成了青少年面对人际关系困境而采取的自我保护的极端措施之一。蛰居者脱离了社会,切断了自我与他人之间的联系,丧失了与社会的互动和人际交往,与家庭和社会出现了背离,变得越来越孤立和封闭。蛰居者们并非不愿意与外界交流,而是“想与人交往却不能交往”。这种人际关系危机几乎是所有蛰居者面临的共同问题。

## 二、耻感文化加剧蛰居青少年的耻感意识

### (一) 耻感文化根深蒂固

“耻感文化”是美国文化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提出的有关日本民族性格的理论。她指出“真正的耻感文化依靠外部的强制力来做善行。真正的罪感文化则依靠罪恶感在内心的反映来做善行。羞耻是对别人批判的反应。一个人感到羞耻,是因为他或者被公开讥笑、排斥,或者他自己感觉被讥笑,不管是哪一种,羞耻感都是一种有效的强制力。羞耻感要求有外人在场,至少要感觉到有外人在场。”<sup>[6]</sup>也就是说,耻感文化是以耻为主要的强制力,这种强制力主要在于外部社会而不在于人的内心。作者还指出“耻感在日本人生活中的重要性,恰如一切看中耻辱的部落或民族一样,其意义在于,任何人都十分注意社会对自己行动的评价”<sup>[7]</sup>。

耻感文化约束着日本人的言行。日本人十分在意别人的看法,喜欢将自己融入到集体中,与大家保持一致。日本人的自我是依存于他人的,总是倾向于与他人保持一致,在与人际交往中常常保持被动的接受姿态;对于突然的破绽、突然的自我暴露感到非常害羞,对出丑、丢脸感到非常恐惧<sup>[8]</sup>。在耻感文化影响下,日本人的人际交往过于敏感和注意细节。为了将自己融入大多数人中不被注意,他们处处小心翼翼,处处留意别人的看法,尽量避免特立独行。从语言、举止行为,甚至于着装等各个方面都非常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是不是会给他人带来麻烦,会不会引起他人注意。日本人认真工作,是因为绝大多数人都在认真工作,自己也不能例外。别人加班,自己即便已经完成了工作量,也要随大家一起加班。别人怎样打扮,那么自己也要按照大众的审美标准来穿着。察言观色、说话轻声细语、小心翼翼的日本人,总是面带微笑、很有礼貌地与人交谈。耻感文化已经深入骨髓,成为日本国民性的重要组成部分。

### (二) “不给别人添麻烦”的行事准则

耻感文化对日本人的性格和行为方式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其中,“不给别人添麻烦”的行事准则就是其重要影响之一。所谓“不给别人添麻烦”,就是要做好自己的分内之事。例如,学生要努力学习,不给父母和老师添麻烦;家庭主妇也要做好持家育儿的工作,不给丈夫和周边邻居添麻烦;职场人就要做好本职工作,不给领导和其他同事带来麻烦,等等。对个体而言,做

好自己的本分和本职工作就是“不给别人添麻烦”的最好诠释。在日本人的观念中,让别人不快、让别人担心、不劳而获等给别人添麻烦的行为都是让自身感到耻辱的事情。

日本人从小接受“不给别人添麻烦”的教育。“不给别人添麻烦”的观念已经渗透到青少年生活的各个方面,成为一种基本的生活准则。早在1970年11月,日本总理府青少年对策本部对全国15-24岁年龄段的161700人开展了“青少年的人生观和生活意识”的调查,在针对“当你身处街上或者电车中等人员众多的地方,会采取什么样的态度”的提问中,60%的人选择“首先不给他添麻烦”,还有28.4%的人选择,自己的行动是建立在不给他添麻烦的前提下,只有1%的人不怎么在意他人<sup>[9]</sup>。另外,1987年日本NHK广播文化调查研究所舆论调查部开展的“初中生、高中生的生活和意识”的调查结果显示,绝大多数中学生认可“不给他添麻烦”的生活方式,其中初中生的赞成率为60.6%,高中生为49.9%<sup>[10]</sup>。可见,日本青少年在为人处事的过程中,尽力使自己的欲求服从于社会的规范意识,而不是超越规范来满足自我的欲求。

耻感文化虽然成就了日本人高度自律的国民性格,但是却不利于现代人际关系的形成。现代社会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时代不同,是一个相互依赖、互有所求的社会。这种“不给别人添麻烦”、自我约束性强的国民性格,在使得相互间的交往变得简单的同时,却缺乏深层的交流。“不给别人添麻烦”,也就意味着不会与他人有过多的交集。在礼仪和客气中,掩盖着冷漠和自私,缺少人情味。很多日本社会学家指责日本人冷漠时,常用的一句话是“只关注自己周围一米内”。“不给别人添麻烦”成为人际关系的基本准则,然而,这种行事准则背后是人际交往的淡薄和疏远。

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蛰居现象萌芽之时,日本青少年的人际关系已经出现了疏远的迹象。现在,10-29岁年轻人的人际关系普遍存在以下特征:讨厌亲密关系,过于在意是不是会给对方添麻烦,相互间不谈心,也不过于依赖。他们之间会尽力回避涉及到内心的、有纠葛的话题,对此经常用“沉重”一词来敷衍处理<sup>[11]</sup>。大阪市NPO法人“年轻人国际支援协会”理事、曾经有过蛰居经历的横山泰三指出“日语中的‘麻烦’一词本身就具有排外感。说起日本人,如果想找人商量,或者面临困难,即便是家人,也不能添麻烦。这已经根植于日本独特的文化和美德中。但是也成为了阻碍交流的最主要原因。”<sup>[12]</sup>当今日本青少年奉行礼仪主义,遵守社会规范。但是在谦和礼貌、举止得体、遵守社会秩序和规范的背后,隐藏的是孤独和寂寞。这种行事准则也使得很多蛰居者在不能实现自我独立的情况下,出于“不能给别人添麻烦”的心理,而不得不放弃回归社会的努力,蜷缩在自我的世界中。

### (三) 蛰居青少年强烈的耻感意识

日本耻感文化中回避冲突、回避矛盾的文化习惯,给青少年带来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在耻感文化的熏染下,青少年在人际关系方面表现得谨小慎微。他们坚持“不给别人添麻烦”的行事准则,回避与对方的亲密交往,避免过于关注对方的事情。青少年之间的交往保持界限和距离,不谈论自己的苦恼、担忧等个人问题,他们认为,相互间“维持良好人际关系的秘诀,是只限于在爱好和兴趣上同人交往,其余一概不接触”<sup>[13]</sup>。而且,大家之间的交谈尽力回避隐私的、有分歧的话题。每个人最在意的是“不想伤害对方,也不想让自己受伤”。虽然从表面上看,日本孩子也在一起有说有笑,但是他们的交往仅限于一起开玩笑、玩耍。同学、朋友甚至家人之间都尽量避免冲突和争论,以此来回避意见分歧,相互间只维持表面的人际交往。由此带来的人际关系危机成为诱发蛰居问题的文化根源之一。

耻感文化使得蛰居者及其家人都无法摆脱“蛰居是耻辱”的观念。对于蛰居者本人及其家庭来说,蛰居并非光彩之事,他们极力隐瞒自己或家人的真实情况。蛰居者本人对于处于蛰居状态的自己,具有耻辱感。自尊心极强的他们不想让外人知道自己的颓废之态,一旦蛰居,他们

不仅会降低外出频率,还会自我断绝与他人的联系,甚至包括曾经很要好的同学和朋友。严重者会尽量避开家人,不与家人一起用餐,避免与家人接触和交流。万不得已需要父母帮助时,也是用便签留言等方式避开面对面的交流。蛰居者害怕与人见面,非常在意他人的言行,过度回避他人的目光。据KHJ父母会(家庭会)的调查,约有60%—80%的蛰居者存在“在意别人目光”“不让别人进自己房间”等问题;约半数的人“对声音敏感”“害怕他人”<sup>①</sup>。蛰居者表现出的“在意别人目光”“害怕外出和与人交往”“自信心缺失”及“找不到自身存在的社会价值”等,都与根植于日本人内心的耻感文化密切相关。

不仅蛰居者本人,而且其家人也认为,蛰居是“家庭的耻辱”。孩子蛰居后,很多家庭为了隐瞒孩子蛰居的事实,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为了不让周围的人知道而极力隐瞒于亲戚朋友和左邻右舍,减少与亲友和邻里的交往。深夜出去倒垃圾,以避免被邻居询问“孩子的情况”。这种耻感意识,使得蛰居者及其家人不能从“家庭的耻辱”中解脱出来,也不会主动寻求他人的帮助。很多蛰居者家庭在社会上处于被孤立的境地,充满罪恶感和无力感。他们很难找到可以倾诉的对象。即便是寻求支援,也选择离家比较远的、没有熟人的咨询机构。可以说,耻感意识延误了蛰居者寻求支援的最佳时机,导致蛰居问题出现了长期化和高龄化的趋势。

### 三、集团主义教育与文化加重了蛰居青少年的孤立性

#### (一) 集团主义教育下自我的缺失

集团主义是日本最典型的文化传统之一。这种集团主义,不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对天皇的崇拜和绝对服从中体现得淋漓尽致,而且,战后日本的家庭、学校及企业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被集团主义意识包围着。正如李卓所说,在思维方式上,日本人具有强烈的集团归属意识,人们时时意识到自己属于集团的一员,“自我”是以社会群体的方式体现出来的。个人应该属于某一集团,集团成员由一种共同命运和共同利益联系在一起。这种集团的概念,对于现代日本人来说,最重要的是自己所供职、求学的企业、机关、学校<sup>[14]</sup>。现代日本社会中,潜在的集团意识是根深蒂固的,日本的社会结构按照集团单位被划分,如果不将自己融入其中,就无法生活下去。正因为不想离开学校,学生受欺凌到必须自杀的程度也会去学校上学;正因为不想离开公司,员工一直工作到过劳死也不愿意辞职。这些悲剧的产生都是源于人们内心深处存在的不安全感<sup>[15]</sup>,不上学、不工作就会产生不安全感。所以日本人为了掩饰这种不安全感,就要拼命地工作,努力将自己融入某个集体中,从而获得一种心理上的安心感。

日本社会奉行集团主义,如何融入集团,成为集团中的一员,是日本人的必修课。日本很重视集体意识与协作精神的培养。集团主义教育就是以培养集团主义的人为目标的教育。所谓集团主义的人,是指具有将自身作为集团一部分的自觉和集团感情,视集团利益优先于个人利益的人。集团主义教育从小就渗透到青少年的日常生活中,这一点从日本的家庭教育中可以窥见一斑。

日本父母总是教育孩子要学会察言观色,注重培养孩子的集体主义意识。日本母亲一开始就引导儿童学会如何与集团成员和睦相处,不做出格的事情。教育孩子,只有通过集团的协调一致,个人才能得到他人的热情关照,个人的愿望才能自然而然地变成现实。学校教育也强调平等一致性,注意培养集体观念。日本从幼儿园时期就开始注重培养孩子的集体观念,教育孩

<sup>①</sup> 参见境泉洋等《关于蛰居实况调查报告书—NPO法人全国蛰居KHJ父母会的实况》,志学馆大学人际关系系境泉洋研究室,2004年。

子要与大家保持一致,不能搞特殊,穿衣吃饭都要和大家保持一致,否则就会给别人带来不安感。企业中同样要讲究集团主义。公司和职员之间本是相互间负有权利和义务的契约关系,但是,对于日本人来说,日本的公司和职员的关系,就像母子关系一样。公司的领导像母亲一样为职员考虑各种各样的事情,当公司效益不景气时,公司领导首先减薪;职员也依赖公司,双方间形成了相互依存的关系<sup>[16]</sup>。

现代日本人依然践行着集团主义的准则。强调个人首先是群体的一部分,个人与集体融合为一体,始终要和谐共存。正如土居健郎指出的“日本人喜欢团体活动,不擅于独自行动,因为独来独往很容易被误解为叛离集团的行为,所以他们不愿搞个人行动”<sup>[17]</sup>。在日本,个性、搞特殊就意味着脱离了集体,会被集体所排斥。因此,从学校到企业都努力维持着集团主义,自己不搞特殊,即便有想法也不随意提出来,待人接物都笑脸相迎,大家穿统一的衣服,这样就避免了因服装差异带来的不同。学生穿统一的制服,企业员工穿统一的正装,然后大家都使用一张相似的笑脸,说话都温柔和气,尽量回避正面交锋,遇事协商解决等等这些生活细节中都体现着集团主义。“凡事随大流”“和大家一样”就成为大多数日本人的行为判断标准。很多孩子为了不被集团排斥而拼命地迎合,即便是自己不愿意的事情,也表现出和大家有一样的兴趣爱好。迷你裙的流行也是由于大家不愿意与众不同,即便不喜欢穿迷你裙,因为周边的同学或朋友都在穿,自己也必须和大家保持一致。特别极端的事例是,有些中学女生从事援助交际等不良行为,仅仅是为了与朋友保持一致。在她们的心目中,能融入朋友圈,不被集体排斥,比什么都重要。

然而,这种集团主义教育与当今日本青少年追求个性化生活方式出现了价值观冲突。早在20世纪70年代,日本社会富裕后,伴随着西方个人主义价值观的传入,日本社会意识开始由集体主义向个人主义转化。青少年的个人主义滋生,他们强调自我,一切以自我为中心,要忠实于自我地生活。到了20世纪90年代,日本社会进入泡沫经济崩溃后面临全面转型的多元化时代,在全球化、国际化迅速发展的背景下,青少年个人主义意识进一步增强,集团主义文化受到质疑,“学历社会”和“划一式”的集团主义教育体制也受到批判。与强调集团性和一体化的集团主义教育不同,承认个性化、注重个性培养已成为当今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 (二) 集团主义文化下蛰居青少年孤立性凸显

在集团主义文化影响下,日本社会崇尚团体型的人际关系,集团成员之间相互依存。日本人的的人际关系可以在自己工作的单位、自己所属的团体中体现出来。人是社会性动物,当人失去集体时,就无法生存下去,因此,所谓身份就是对集体(共同体)的归属意识<sup>[18]</sup>。当人们失去所属团体时,通常会有一种孤立感和丧失自我的感觉。在集团主义文化的影响下,绝大多数日本人都能够很好地适应日本文化中的“空気を読む”(Kuuki Yomu),即能够读懂氛围,察言观色,理解对方的言外之意,保持恰当的言行举止。

不过,这种集团主义文化抹杀了青少年的个性,使得与众不同、有个性的孩子受到孤立,不被大家认可,甚至成为受欺凌的对象。日本中小学发生的集体排斥某一个学生的校园欺凌问题与日本人的集团主义文化有着一定的联系。集团主义的特点是否定自我,强调绝对的统一。这导致日本人文化心理、思维方式高度的同质,和对集团内部异质存在的排斥。不管你的水平高还是低,只要存在与其他大多数人不同的地方,就很容易成为被大家孤立的对象。心理专家丸田认为,欺凌现象是“寻找投射对象”的一种形式。这位专家说“‘寻找投射对象’加强了一个组织的团结。这种现象在各地都是如此。通过袭击或排斥一个人,这个组织的其他成员获得了心理和精神上的稳定感。”<sup>[19]</sup>在某个团体中,言行举止、性格比较特别的成员,常常成为众人欺凌的对象。太胖、动作迟钝、脏、转校生、外国人或混血儿等常常成为被欺凌的借口,有时甚至是

优等生、长得漂亮也容易成为被嫉妒的对象而受欺凌。

校园欺凌又是引发蛰居的重要因素之一,很多蛰居者在中小学阶段都曾有过受欺凌的经历。在集团主义文化背景下,自我的缺失加重了青少年的孤立性。不能融入集体的人,就会受到孤立,从而受到排挤,最终会失去自信,认为自己是无用之人,进而不登校,闭居在家,回避社会关系和人际交往,从而走上长期化的蛰居之路。

在处处以集团主义为准则的日本社会中,很容易让那些遭受校园欺凌、不登校及无法适应职场生活的青少年失去容身之所。学校不能去,单位也不能去,街坊邻居也会投以异样眼光。孤独、自卑的他们逐渐封闭自己,自暴自弃,断绝与他人的联系,走上消极避世的蛰居之路。由蛰居者们创建的兵库县 NPO 法人团体负责人森下彻指出“无论是在家里、学校,还是社会,想说的话不能说。如果和别人不同,或者说反对的意见,就会出现一种立即被否定并被排斥的气氛。这种适合强者生存,对弱者来说很难立足的社会,也是精神障碍和蛰居的原因之一。”<sup>[20]</sup>此外,日本精神科医生中垣内正和指出“蛰居的本质是孤立。蛰居者本人被社会孤立的同时,也被父母和家人孤立。”<sup>[21]</sup>总之,在人际关系危机日益加剧的当今日本社会,寂寞、孤独成为蛰居青少年的常态化精神状态。

结语:蛰居问题是战后日本进入富裕社会后出现的新型青少年问题,至今已有近四十年的历史,第一代蛰居者也已步入了中老年行列。目前,中老年蛰居者已高达数十万人,“8050 问题”即蛰居者父母超过了 80 岁,蛰居者 50 多岁的现象凸显。当年迈父母逝去后,失去经济来源的中老年蛰居者将陷入生存困境。近年来,年迈父母杀害蛰居孩子的案件频发,蛰居者饿死家中的案例也时有发生。这些家庭悲剧为日本敲响了警钟。目前,日本政府已拨专款应对中老年蛰居者的生存问题,此外,还应该把恢复蛰居者的人际关系作为援助重点,让蛰居者及其家人抛弃“蛰居是耻辱”的观念,勇敢面对问题,积极寻求他人的帮助,以避免上述悲剧的重演。

## [ 参 考 文 献 ]

- [1] 上山和树《我是蛰居者》,东京:讲谈社 2001 年版,第 133 页。
- [2][3][17] 土居健郎《日本人的心理结构》,阎小妹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7 年版,第 16、19、35 页。
- [4][16] 千石保《何时成为日本人》,东京:小学馆 1984 年版,第 21、20-21 页。
- [5] 师艳荣《日本青少年“无缘化”现象解析》,载《中国青年社会科学》2015 年第 2 期。
- [6][7] 鲁思·本尼迪克特《菊与刀》,吕万和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0 年版,第 154、155 页。
- [8] 董存梅《日本青少年隐蔽性人格的社会文化根源》,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 年 5 月 6 日。
- [9] 总理府青少年对策本部《关于青少年连带感的调查(4) 人生观和生活意识》,载《青少年问题》,1971 年第 10 期。
- [10] 总务厅青少年对策本部《青少年白皮书》,东京:大藏省印刷局 1990 年版,第 42 页。
- [11] 近藤直司 长谷川俊雄《蛰居的理解和援助》,东京:萌文社 1999 年版,第 50 页。
- [12][20] 池上正树《成年人的蛰居》,东京:讲谈社 2014 年版,第 90、91 页。
- [13] 千石保《“认真”的崩溃——新日本人论》,何培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9 年版,第 84 页。
- [14] 李 卓《日本国民性的几点特征》,载《日语学习与研究》2007 年第 5 期。
- [15] 山下耕平《为迷途少年探寻生活下去的方法》,京都:北大路书房 2009 年版,第 87 页。
- [18] 橘 玲《日本人——括号里的日本人》,周以量译,北京:中信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66 页。
- [19] 《社会应对校园欺凌“零容忍”》,载《参考消息》2006 年 12 月 1 日。
- [21] 中垣内正和《初次的蛰居门诊》,东京:八一出版 2008 年版,第 64 页。

(责任编辑:王俊华)